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Century to the Other

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

夏禹龙 主编



Social Science from
the Century to the Other

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

夏禹龙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

夏禹龙 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人民出版社蒲圻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2插页 31.3万字

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630

ISBN 7—216—00932—0

C·70 定价：5.40元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主编：夏禹龙

作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兴成	孙克勤	李君如
陈招顺	陈燮君	沈铭贤
胡世禄	段成瑞	莫作钦
夏禹龙	潘光	

前 言

我在1989年6月出版的《社会科学学》的前言中，曾提出“要开拓社会科学学研究的新领域”。为了研究的继续拓展和深入，应“对社会科学学的各个方面作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一批专门的著作”。这个愿望提出来后，至今已历三个年头。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三年中，已有一批有关的专门著作相继出版，对社会科学学的一些主要方面均有所涉猎，初步显示出社会科学学研究领域的大致轮廓。据不全面的了解，三年中已出版的著作：在社会认识论方面，有陶远华著的《理智的困惑》（东方出版社1989年6月版）和欧阳康著的《社会认识论导论》；在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有陈波等著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9月版）、王崇德编著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要论》（学林出版社1990年5月版）和李达顺等著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1月版）；在社会科学史方面，有许志峰、李德深、马万里主编的《社会科学史》（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8月版）；在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方面，有陈建坤、郑贵斌主编的《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概论》（东方出版社1990年6月版）、郑贵斌主编的《青年科研人员成才与管理》（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年8月版）和杨植、方一明著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思路》（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本书则带有社会科学发​​展预测学的性质，也可以说是在上述门类以外新开辟的一个门类吧！

本书体现了同名课题的研究成果，它从1990年初开始，至1992年初完成，历时两年，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本课题组成员有十一人（均为本书作者），分属中国、上海和四川三家社会科学院。为了集思广益，统一认识，搞好总体设计，协调写作提纲，解决理论难点，曾举行过四次工作会议或学术讨论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本书的内容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时代性，它所涉及的知识面非常广泛，我虽兴趣不窄、涉猎较宽，但以个人所拥有的知识而言，显然无法与之相适应。只有把不同专长的学者结合起来，才能胜任。何况，时代的进程对本书的出版提出及时性的要求。本书如果单由一个人来承担，即使能够完成，那也势必大大拖延时日，成为“明日黄花”。感谢参加本书写作的各位同志，正是由于他们成功的、高效的通力合作，才使本书得以按预定目标及时地与读者见面。我深信，群体研究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有效的形式，今后还将身体力行。

本书各章的作者是：绪论、第一章、第四章、结束语——夏禹龙；第二章、第六章——陈招顺；第三章、第十六章——李君如；第五章、第十七章——孙克勤；第七章——潘光；第八章——段成瑞；第九章、第十四章——胡世禄；第十章、第十一章——王兴成；第十二章——沈铭贤；第十三章、第十五章——陈燮君；第十八章——莫作钦。

夏禹龙

1992年2月

目 录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篇 社会科学研究热点	101
第一章 社会主义理论	11
第二章 世界新格局	30
第三章 现代化问题	51
第四章 人权问题	74
第五章 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94
第六章 国家干预与市场	114
第七章 民族问题	139
第八章 社会病	156
第九章 人与自然	181
第二篇 社会科学发展的特征	203
第十章 全球问题研究举世瞩目	204
第十一章 东西方文化互补日趋活跃	227
第十二章 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在冲突中交融	250
第十三章 分析与综合走向系统化	274
第三篇 振兴中国社会科学契机	298
第十四章 优化社会科学的知识结构	299
第十五章 更新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	318
第十六章 人才的合理配置与潜力发挥	337

第十七章 科学研究体制的活化	352
第十八章 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362
结束语	386
参考文献	390

绪 论

《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是一部带有预测学性质的社会科学著作。这里所说的“世纪之交”，大致是指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这将近20年的时限。这一段时限，对于人类漫长的历史来说，只是一个瞬间，但它却不是一个平常的瞬间，而是一个有超常意义的瞬间。在这个瞬间里，社会科学将有长足的进展。紧紧抓住这一弥足珍贵的时机，从宏观上加以科学的把握，有远见地作出有力的战略部署，当会促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在世界上放出耀眼的光辉。

一 “世纪换千”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非同寻常，既是“世纪换百”，又是“世纪换千”。我们应比照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段来认识它的重要意义。

1. 新产业革命的兴起

第一次产业革命是由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珍妮纺车）的发明推动起来的。技术革命的导火线引发了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迅速代替了手工业，使一批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先后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

第二次产业革命导源于以电的应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从19世纪30年代法拉第发现感应电流开始，到80年代爱迪生完善了西

门子发电机，以及在此期间电磁式电讯机、电灯的发明，迎来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使电气化时代与20世纪同时降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场新科学革命与新技术革命交织进行，被人们称为“科学技术革命”。它从1945年发明电子计算机开始，包括核物理和核技术、新型材料、空间科学和航天技术、微电子学和技术、超导理论和技术、激光理论和技术、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等高科学技术部门自50年代至90年代初的相继诞生和取得重大发展，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势头。但是，从现状来看，许多高技术产业化的程度并不高，有的还没有形成产业，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不高。在世纪之交，高技术产业化的速度将会加快，它们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会明显提高，一场新产业革命正方兴未艾。

在新产业革命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间的竞争加剧。现时代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特别是科技的竞争。在竞争过程中，发达国家处于有利地位，南北差距将可能拉大。

在新产业革命的形势下，世界面临一场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发达国家致力于高技术产业化，明显地增加高技术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而把一些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层次较低的产业转移出去。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接受转移产业的同时，努力提高自己产业的技术层次。国际产业分工将会出现新的变化。

在新产业革命的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统制经济体制，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要求，导致在科技进步步伐上的落后。一方面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另一方面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体制改革普遍地开展起来，尽管经历了重大挫折，也出现了一些好的势头。

在新产业革命的形势下，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旧秩序被打破，新秩序还有待建立。世纪之交将是国际新旧秩序的一个交替时期。

2. 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11世纪初,中国的北宋王朝正处于科学文化的高峰时期,而欧洲却陷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代。13、14世纪,中国发明的火药、罗盘针相继传入欧洲。15世纪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由蒙古人带到欧洲。这三大发明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马克思所生动描绘的:“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①

在1000年到2000年的一千年中,东西方文化交流从起始及随后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是东方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可是,以14世纪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为契机,西方文化逐渐赶了上来。其后,经过17世纪从英国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同样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使欧洲跃居世界前列,而亚洲则明显地落后。其间,尽管东方文化继续对西方产生有益的影响,如英国近代文官制度就借鉴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也以中国为其理想等,但是,总的说来,却是一派欧风东渐的气象。随着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进程,在海盗式的劫掠、欺诈性的贸易、传教士的渗透、殖民地的占有的同时,西方近代文化也以排山倒海之势向东方涌过来。1582年利玛窦来中国,向中国介绍了西方近代科学。1840年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开始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

时光移到20世纪60年代,东方亚洲太平洋地区又出现了复兴的兆头。先是60年代日本的起飞,继之是70年代的“四小龙”,80年代后期又扩展到东南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特

① 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别是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经济迅猛发展,为世界所瞩目。自1960年到1980年,亚太地区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而欧洲只有4.5%。自1970年到1978年,亚太地区各国贸易量年平均增长率达19.7%,大大高于欧洲。进入90年代,1990年亚太地区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5.7%,比世界年平均增长率几乎高出1倍。在1991年西方经济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亚太地区一枝独秀,经济增长率仍能保持在5%以上的水平。在国际贸易领域内,亚太地区也是最富有活力的地区。

亚太地区经济的复兴,使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日益受到世人的重视。它说明并非只有西方文化一家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在经过提炼、融合和改造的东方文化背景下,同样可以把现代化建设事业搞好,甚至搞得更好。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精神文明大大滞后,出现了严重的“跛脚”现象,这也促使西方有识之士到东方文化中寻找补救之策。瞻望世纪之交,东方文化的影响将会继续扩大,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倚重于西风东移的局面将会有所改观。形成东西方文化并驾齐驱的格局固然还有待时日,但两者在冲突中走向互补则是可以预期的。

3. 战争与和平的转换

在1000年到2000年的一千年中,战争与和平总是不断交替。

从11世纪开始,规模和影响大的古代战争:一是十字军东侵。从1096年到1291年西欧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罗马天主教会,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发动八次侵略性远征。二是蒙古军西征。从1219年成吉思汗发动第一次西征,到1236年窝阔台命拔都西征,一直深入到欧洲中部。到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发动了几乎遍及全球的各种殖民战争。

可是,把战争的规模和灾难推向顶端的却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两战。在1914年到1918年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卷

入这次战争的国家达到33个，导致两千余万人死亡、两千余万人伤残。发生在30年代到40年代中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后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卷入战争，导致的破坏和人员伤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大，堪称在人类历史上空前。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当前，出现了40多年的相对和平的时期。特别是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华沙条约国组织和苏联的解体，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冷战局面宣告结束，新的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避免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与此同时，民族矛盾更显突出，局部战争此起彼落，将会贯穿在世纪之交的年代中。

综上所述，世纪之交将是全球性产业结构的调整时期和国际新旧秩序的交替时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从一向偏重趋向双向大致平衡的变化时期，也是战争与和平转换的关键时期。和平与发展将成为21世纪的两个主旋律。世纪之交无论从100年还是从1000年来看，都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二 社会矛盾的展开、转换和复杂化为 发展社会科学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界远在人类诞生以前已经存在，它的变化很缓慢，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忽略不计，而人类社会的变化要比自然界快得多，并且还在不断地加速。正因为如此，所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研究条件的成熟程度，而社会科学的发展则主要取决于对象的成熟程度，也就是说，取决于社会矛盾运动的展开程度。世纪之交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展开、转换和复杂化，给社会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 世界新旧格局的转换

由于东欧剧变、华沙条约国组织和苏联的解体，由于美国力

量的削弱和日本、德国的新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被称为“雅尔塔体制”的、以美苏争霸为特征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打破，而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世界处于新旧格局交替的动荡时期。全局趋向缓和，而局部紧张冲突依然存在。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特别是美国与日本、西欧之间的矛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的是各种地区性的民族矛盾，它们相互交叉、影响、渗透、变换，汇合成一幅色彩斑斓的社会矛盾世界图景。

2. 意识形态与民族利益的交叉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在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得逞时，历来对之采取和平演变的斗争策略。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即与这种斗争策略的实施有关。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重视用从资产阶级价值观念来理解的“民主、自由、人权”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把它们引入国际关系，并与经济贸易问题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渗透与反渗透的矛盾加剧。但是，民族之间的利害冲突在当前世界上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存在，民族利益往往是各国以至各政治集团决定行动时的首要考虑。意识形态矛盾与民族利害矛盾的交叉，是世纪之交矛盾的一大特征。

3. 经济上依赖与竞争的同增

新产业革命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发展，使国际分工和协作达到全球性的规模，世界市场进一步一体化。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在经济上闭关自守，而不依赖于其他国家。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加深，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则是世界市场中竞争的加剧。在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新形势下，世界各国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打破了旧的平衡，使世界市场上的

竞争更趋激烈。加上90年代起世界性的经济衰退，情况就更是如此。为了在竞争中增加力量的砝码，出现了经济区域化的趋势，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世界市场上一体化和区域化两种趋势同时并存。先行现代化国家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后发现代化国家不甘落后，竭力设法赶上，至少要扭转南北双方差距继续拉大的局面。围绕现代化问题，各种矛盾正在展开和趋于明朗化。为了寻找适合于目前世界市场竞争态势的经济运行机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主张削弱国家干预、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抬头，而面临当前的经济衰退，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的新凯恩斯主义也趋于活跃；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运行机制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始终是困扰着决策当局的一个难题，不过在不断探索中已取得不小的进展。

4.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争斗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作为两大思潮，都已各有几百年的历史。随着19世纪，特别是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主义日益盛行，居于主导地位。可是，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科学技术的成就被应用于战争，造成人类空前的灾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对于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其他负面作用，也日益显露。人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界采取征服者的态度，这种态度遭到自然界的报复，造成人类自然环境受严重污染，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自然资源走向枯竭等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创造出无比灿烂的现代物质文明，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却出现了种种丑恶不堪的现象，诸如恐怖行为、吸毒贩毒、赌博、卖淫嫖娼、青少年犯罪等种种“社会病”。这样，人文主义者反科学的倾向又有所抬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者在冲突中又出现了交融的趋势。在世纪之交，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加强。

上述种种社会矛盾的展开、转换和复杂化，既凝聚为世纪之

交社会科学研究热点，又形成了世纪之交社会科学发展的特征，为世纪之交社会科学预示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三 中国社会科学将有希望在 世纪之交放出异彩

中国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近十几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从总的水平上看，还没有居于世界的前列，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不够大。我们应抓住世纪之交这个千载难逢的时机，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地迎接挑战，争取使中国社会科学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其有利的条件是：

1. 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的突出地位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文明古国之一。历史虽然不算最悠久（及不上埃及），但是像中国文化那样一脉相承、从未间断的，却是世所罕见的（巴比伦已不存在了，现代的埃及人、希腊人在人种上也已经不是古代的埃及人、希腊人）。在长达三千年的古代，中国文化始终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形成地域辽阔的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圈。当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发源于西欧的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把它们的社会理论和价值观念强行向世界推销的时候，能够别树一帜、与之抗衡的东方文化，最有可能的就是有悠久传统的中国文化。

2. 亚太地区在经济上的崛起

一种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与该种文化圈的经济实力有相当大的关系。60年代后亚太地区各国相继经济起飞，经济增长率始终处于世界前列，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升高，21世纪世界经济中心东移之说日益被更多的学者和政治家所接受。这就为以东方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东西方文化的互补性

西方文化中的机械性和分析性思维以及法治观念等，对于近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现代科学的兴起，以20世纪初创立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标志，使辩证性、综合性、系统性的特征日益明显，引起了西方学术界从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思想渊源的浓厚兴趣，“易经热”、“老子热”等即由此而起。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使东方的伦理原则、价值观念、管理思想等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各种“社会病”的恶化以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强烈的反差，也使西方有识之士到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中寻求救治的药方。

4.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背景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是创立于西方文化背景之上的。它传到中国来，经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努力，已经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毛泽东思想。这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成功范例。中国社会科学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优秀文化和国情的坚实地基上，实行开放的方针，批判地吸收世界上各种文化和社会科学包括西方文化和社会科学的精华，就一定能在世纪之交取得重大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社会科学界放出异彩来。